百川通的历史沿革

百川通票号

百川通票号是晋商巨族祁县渠家开设的第一座票号。渠家选择在平遥而不是在祁县开设第一座票号，当时老财东们的筹谋，后人是不得而知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决定在平遥开设票号而且取名百川通，定然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至少，三个方面的因素促成了百川通的定位：一是平遥古城的地理位置，二是平遥票号业的蓬勃兴起，三是老财东渠长瀛的老谋深算。

平遥古城与渠家所在的祁县城相毗邻，地处山西中部汾河冲击平原，交通便利，物产丰富，人口稠密。尧舜时平遥称陶，秦时称平陶，汉置中都京陵，南北朝时废中都京陵，设平陶，后为了避北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魏太武帝拓跋焘讳，改称平遥。到明代，城池建筑形成现在的格局。

平遥城,人称龟城。南门为龟头,南门外原有左右两眼水井，为龟的双目，东西各两道城门，为龟足。其中 3 座城门在出入瓮城时成拐弯，为龟足朝前状。只有下东门为直行门。传说是城东 10 公里慈相寺中的冀郭塔上，一条铁链拴着龟的一只足，把足拉直了。北门为龟尾。城墙周长号称 5 公里,实际 6 公里还多。城墙上有 3000 个垛口,72 个马头处筑有 72 座堞楼，人们通称为贤楼,取孔夫子 3000 弟子、72 贤人的意思。城内 4 大街,8 小街,72 道蚰蜒巷，自然是龟甲上的纵横条纹了。巍巍市楼雄居城中央，南大街从市楼下通过，是古城最繁华的通衢走廊。以南大街为中轴,文庙、武庙、寺院、道观成左右对称布局。人文古迹遍布全城，传说故事俯拾皆是。城外柳根、惠济两条河流抱城而过。南屏太岳群峰，北临滔滔汾水。果然是“左挈绵山托介子，右提昌河举祁奚，践汾水枕太岳，西通汉唐故都，东连华夏新京”。

平遥古城地理位置优越，人杰辈出。特别是从清乾隆时起，工商业日渐发达。店铺字号鳞次栉比,“买卖人”阶层逐渐形成,到清道光时,已形成群体性商业规模。各大字号多有跨省区到外省

外埠设分号的。当时在北京就有平遥许多家字号的分号。北京崇文门外的平遥会馆创始年代更早，主要是颜料行业。到清道光时，往来于北京平遥会馆的也包括汾阳、介休、祁县、灵石等邻近县的同行。

清道光初年，平遥达蒲李家的西裕成颜料铺，在大掌柜雷履泰主持下，首创以汇兑为主要业务的第一家票号——日升昌票号，开我国票号业先河。在票号产生之前，全国经济活动中的白银流通,多是通过镖局运送,费用高,不安全。因夺镖、劫镖而发生的流血争斗，时有发生。商家因失镖而损失破产的也有之。日升昌票号的创立，结束了镖局时代，开创了票号业时代。从此之后，以武术称雄的英雄豪杰的地位，逐渐让位于在商场竞争中以智力、财力取胜的财东掌柜。票号通过分布在各大商埠码头的分号，一纸银票汇通天下，既便捷又安全可靠。票号业的产生和兴起，给工商各业、军政各界，创造了效率和效益，同时也为自己赚得了滚滚钱财。日升昌在雷履泰的经营下，如日中天、繁荣兴旺，曾一度执全国金融业之牛耳。

在日升昌票号的带动与影响下，数年之间平遥相继产生了“蔚泰厚”“蔚丰厚”“蔚盛长”“新泰厚”“天成亨”等票号,以后又有“日新中”“协

和信”“协同庆”等大票号相继出现。有实力、有眼光的介休、榆次等县的财东也纷纷踏足平遥，迅速形成了史称“平遥帮”的票号业群。小小平遥城一时成为全国商业金融中心，几乎占据了全国商业金融业的半壁江山。此时的平遥城，字号店铺林立，门面装饰一家比一家豪华，街面上车水马龙，各家字号门庭若市。随即饮食业、典当业、手工业、织造业、医药业、烟草业等各行各业也蓬勃兴起。有人评论说，平遥城是 19 世纪中国的华尔街。应该说这个比喻是恰当的。赚了钱的巨商大贾们一家攀比一家修建豪宅大院和字号店铺，显示自家的财力，树立自家的形象，光耀自家的门庭，从而又推动了建筑业和建筑艺术的发展，推动了城市建设的日臻完善、完美。由此，人称平遥为小北京。

百川通票号就是在这样的地域环境和时代条件下产生的。

渠家是祁县世代望族。从 18 世纪到 19 世纪中叶，祁县渠家以经商而致殷富。到了 14 世渠同海时，在包头置房买地，开设“长源厚”字号，经营粮食、茶叶等。到了 15 世渠映潢时，在继承父业的基础上又增设“长源川”“长顺川”两大茶庄，从湖广采办茶叶，销往西北各地以及蒙古、俄罗斯，直至欧洲各国，获利极丰。到了 16 世渠长瀛时，

又在长江流域贩运食盐，积累了大量的商业资本。渠家到了 16 世“长”字辈共有 10 门，都是大商家，仅渠长瀛名下就有商号四五十处。在祁县可说是第一富族了。

当平遥票号业兴起时，渠长瀛的商业经营也是蒸蒸日上。渠长瀛老谋深算，在静观平遥票号 30 年，由盛转衰时，年届花甲的渠长瀛决定在平遥城这块强手如林、票号集中的地盘上扩张自家的势力。于清咸丰十年（1860 年）率儿孙投巨资在平遥南大街开设百川通票号，与平遥群雄一争高下。渠长瀛很崇拜其祖渠同海，于是以渠同海的字“百川”为号名，票号取名为“百川通”。

百川通票号的创立，较日升昌、蔚泰厚等大票号晚了 30 多年。日升昌经过 30 多年经营到清咸丰十年（1860 年）前后开始收缩其各地分号，裁汰人员。百川通聘用日升昌的武大德为首任经理。武大德大掌柜在日升昌多年，是票号老手，业务精熟，一开始就身手不凡，先后在太原、大谷、祁县、北京、天津、上海、武昌、汉口、沙市、长沙、湘潭、常德、成都、重庆、贵阳、昆明、梧州、桂林、广州、潮州、汕头、西安、三原等地开设了 23 家分号，主要经营汇兑和存放款业务。为了提高票号的信誉，百川通与别家富商连环结保，并在政府注册，加之渠家的门路，掌柜的能耐，所以百川通多能承揽官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家的汇兑业务。据民国 2 年(1913 年)天成亨等 14 家票号呈北洋政府财政部编制的存放实绩统计表记载,百川通存款 305 万两,放款 350 万两。



百川通正门

渠家很注重网罗人才。在武大德之后,先后聘用本族人渠川至及平遥人庞义山、刘敬义、雷思孝任大掌柜。百川通 5 任经理,诚信敬业,使百川通很快在强手云集的平遥帮中成为后起之秀,实际财力一度时期超过别家。

百川通与其他票号一样,股本为银股,分红时又有人股参与。初创时有银股 10 股,每股 1 万两,另有 20 股人股,分红时按 30 股均分,4 年一结账。

百川通东家掌柜协力,经营有方,所以生意十

分兴旺,分红也很丰厚,一般情况每股分红 1 万多两白银，最高时有 2 万多两，甚至近 3 万两。在百川通 59 年经历中，共分红白银 600 多万两。

百川通的经营之道，《祁县渠家》一书中有这样一段叙述：

“百川通各分号人员配置精干，要求恪守职责。以汉口为例，总号确立汉口分号 6 人,且由总号派充，在外不准雇用。分工为：掌柜 1 人,跑街 2 人,会计 1 人,信房 1 人,帮写(练习生)1 人。后来考虑到汉口码头生意较多，单这 6 人只能办理业务上的事。像招待客人、送银、送信等事必须在当地雇人，才又雇用 12 人:公事(招待、送银等杂事)6人、轿夫（掌柜外出)3 人、厨师 2 人、守门 1 人。”

百川通的汇水（汇费）是以汇兑两地平色的高下，期口的淡旺，月息的大小，路途之远近作估定标准的。《支那省别全志》记,1914 年百川通由昆明汇往各地的汇水：北京每百两收汇水 4 两,汉口、长沙、西安、成都、重庆、沙市每百两收汇水3.5两。

百川通是最早使用电汇的票号之一。据记载，清光绪十一年(1885 年),百川通等 8 家票号采用电报汇兑方式，承汇广东归还宝源祥款 13.5 万两，解交海军衙门。12 月 21 日发交票号,限 12

月 27 日交到。清光绪十七年(1891 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奏折附片》云：“ 兹据湖北布政使王之春会同善后局司通祥称：可见于十七年实协桂饷之外加拨银一万两，发交百川通商号电汇广东善后局兑收，凑付镇南关炮费等情详请咨奏前来。 ”

从上述记叙中可看出，百川通在当时管理很完善，业务很兴旺，经营手段很先进，与官家关系很密切。

结交官府、官商联结是当时豪商大贾的时尚，也是上流社会的风气。渠家当时与山西巡抚曾国荃、张之洞往来密切，至于和祁(县)平(遥)两县的县衙往来更是频繁。从某种角度讲，七品县令还得仰仗像百川通这样的豪门大族财力上的支持才能仕途无量。那个时候有这样的传说，七品县令到了大票号没自己的坐处。那个时代，即使考取了功名的士子，如果没有雄厚的财力的支持也得不到实缺。所以县府州省各衙门官员多是大票号的常客。

清光绪六年(1880 年)，中俄有外交争端，清廷派曾国荃驻防乐亭，以防东北之变，大财东渠源浈应邀随军做幕宾，帮助筹办粮饷。

清光绪十五年(1889 年)，山西巡抚张之洞升任两广总督。渠家指示百川通大掌柜，速派得力伙友随张之洞同赴广州，开设百川通分号。沿路

总督大人的一切花销开支由百川通包揽下来。张之洞到总督府就任之日，也就是百川通广州分号设立之时。很快又在汕头开设分号，归广州分号调节。

从上述两例可看出百川通与官府的关系。



百川通前院

总督大人需要大票号作经济支柱，百川通则

仰仗官府衙门作财路后台。官商联结，百川通左右逢源。民间流传“百川通的银子，张之洞的门子”，道尽这种官商联结的权钱关系。直至辛亥革命后，阎锡山的山西省军政府财政困难，也是渠家借给 30 万元巨款，缓解了财政危机。当然渠家得到的回报也是丰厚的。以后渠家在山西的工业企业双福火柴公司的兴盛，和渠家在山西工商界的地位日益巩固，与此不无关系。

百川通的成功为渠家树立了榜样。两年后，风华正茂的旺财主渠源浈在祁县城投 30 万两白银开设了三晋源票号。以后渠家相继又开设了“存义公”“江源通”“长盛川”几家票号。至此，百川通与其他几家票号共同把渠家的商业金融业推向了顶峰。

百川通在其中后期也遭受过两次外部因素的打击。据资料载，一次在光绪年间，受当时金融风潮的打击，损失白银 20 多万两。第二次是辛亥革命时期战争的打击，仅汉口、长沙两地分号就损失白银不下百万两。即使如此，百川通仍在困境中维持，直至民国 7 年（1918 年），百川通才歇业。

百川通的萎缩歇业，主要是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因素使然，它最终逃不脱萎缩的必然，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大财东渠源浈中途抽走股银也是导致百川通走下坡路的一个重要原因。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百川通如日中天，每股分红高达近 3 万两白银。恰在此时，大财东渠源浈出人意料地在分红后抽走自己的全部股银，这对百川通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当初百川通创办，由渠长瀛、渠源潮、渠源浈、渠源洛、渠本立等出资合办，渠源浈中途抽股，削弱了百川通的实力。渠源浈精明过人，他认为盛极必衰，物极必反，能赚 1 万就有可能赔 10 万，他见好就收。果然在以后的岁月中，百川通一年不如一年。后人评论渠源浈："旺财主，有眼力，赚钱不钻钱眼子。"对于渠源浈，他获得了廉价的赞赏，对于百川通却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在它纵横商海凡 59 年后便不得不歇业了。

永亨银号

百川通歇业的时期，是中国票号业整体衰落期。外国金融资本的渗入，国家三大银行的相继开业，票号渐渐失去了最后一块领地，而大财东们缺乏更高的卓识，拒绝了银行与票号合作合并的意向。在百川通之前和在它之后不久，平遥各大票号全部歇业。银号的出现是在民国 10 年（1912 年）前后到抗日战争爆发这一时期，是平遥金融业的一大特点。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百川通歇业后，平遥大财东达蒲李毓文以4000两白银买下百川通的全部不动产和室内的家具陈设,于民国 12 年（1923 年）开设永亨银号，主要经营存放款业务和汇兑。与永亨银号同期开办的还有设在鹦鹉巷的道生银号，米家巷的大来银号，衙门街的晋裕银号。以后又有十几家银号先后产生,有永成庆、复兴公、洪复祥、恒升庆、绍华、永泰昌、恒裕晋、崇丰厚、厚德恒、同裕、兴隆信、永和兴、晋鸿泰、协和等银号。在所有这些银号中，永亨银号是业务不错的一家。永亨银号在太原、上海、天津、汉口、济南、武昌、漯河等地设有分号，生意兴隆，名噪一时，开始了继百川通之后的又一个繁荣期。

永亨银号东家李毓文,字友泉,是一位有头脑的实业家。早年他在百川通汉口分号当跑街，结识了许多工商界名流，又娶了汉口巨商胡三多堂老板的女儿为妻。后来李毓文离开百川通，做黄金生意，又经营地产，在达蒲有土地七八百亩。在永亨银号开业前后他在平遥还开设另外 6 家字号，在北门头有永裕当铺，达蒲村有永泉当铺，鹦鹉巷有永盛粉坊，南大街有永隆工厂，米粮市有永盛车铺，鸡市口南有永义泉杂货铺，在当时是有实力的财东。

永亨银号开业时有银股 8 股,共有 64000 两

白银,李毓文占 4 股，汉口胡三多堂 2 股，另有散股 2 股。第一任大掌柜是李毓文的换帖兄弟人称小周瑜的裴宪。裴大掌柜精明有心计，永亨银号的生意十分红火。特别是汉口分号掌柜张庆元(字吉善)很有才干。他个头不高,布袍坎肩,胸口常挂一只梳胡须的小梳子，人们见了敬畏三分。他经营的汉口分号非常兴旺，甚至比总号还具有实力。张庆元以 1 万两的资本开设汉口分号，业务框架做到 200 万两，可见此人的本事了。裴宪任大掌柜 8 年，分红颇丰，最高时达到每股分红 1 万银元。蒋冯阎大战后晋军失败，晋钞大幅度贬值,20 多元晋钞只能兑换中央银行的 1 元。当时民间有歌谣：晋钞杀人不用刀，家家户户都穷了。在此形势下，张庆元建议把总号款项全部调入汉口分号，以避免晋钞贬值的损失，裴宪没有同意，只调过去了一部分。为此事东家李毓文心中明白,所以在民国 20 年(1931 年)婉言劝他的把兄弟裴宪‘ 你歇了吧 ”,另请史承镛(字振堂)主持永亨银号。东家为了压压当时任总号副总经理的张庆元、侯伍云,李毓文自任总经理,但仅是挂名而已，实际权力交给了史承镛。在此情势下，裴宪时的得力分号掌柜张庆元、侯伍云、刘云等相继辞职。

史承镛是平遥梁村人，其父史继孔是平遥永顺德的带本掌柜。其祖史敬文 14 岁步入商界,曾

任太谷永泰生布庄驻四川分号经理，颇有积存。家藏白银 4 万多两，可见一生业绩不凡。史承镛 17 岁经商，先到太谷蔚长盛货庄，后到恒裕晋跑街，后来到由榆次“义合永”和平遥冀祖荣合股银 10 万两开办的“义聚厚”任经理。在义聚厚他主持联合祁县、太谷商家与晋南人打了一场官司，从此声名大振。永亨银号东家李毓文在辞退裴宪后便聘史承镛执掌永亨银号。这时候史承镛年届不惑，经商有年，正是炉火纯青。他入主永亨银号后又从义聚厚带过来彭雨生、侯永仁、彭恩华等伙友。上任之日带上自家的床和桌子，人们戏称史掌柜还带着‘嫁妆”。

史承镛擅长社会活动，在他任经理期间与几任平遥县长梁寿国、韩明甫、周敦信都交往密切。民事承审武敬斋、曾任过宁武地方法院首席检察官的平遥人尹鲁斋等地方名流多是永亨银号的座上客。永亨银号当时总揽全县浮存 30 万两白银。其中公家钱粮等公款占了很大比例。所谓浮存是各字号零存整取的短期存款，不支付利息，30 万浮存说明永亨银号的信誉及经营状况是很好的。永亨银号的总体规模可观，每年开支 3 万多两白银。永亨银号的放款利息按季计，也按年计，大约年息 10%左右,最高达到过 11%。

永亨银号曾发行过自己的纸币 6 万元。据永

亨银号老伙友回忆，永亨银号当时在平遥地面影响很大，逢年过节，警察局派员为其站岗，确是别家字号无法比得上的殊荣。继百川通之后，在银号群集的平遥城内，永亨银号在当时是数一数二的。

同蒲铁路修筑开通，从平遥县穿境而过。铁路银号就设在永亨银号内，占门面的北面两间柜房，侯吉甫任总经理。门面的南面两间柜房是汾河河务合作社，雷紫垣任经理。永亨银号的业务进一步巩固。

然而本世纪 30 年代到 40 年代，中华民族遭受了一场空前的灾难，1937 年 7 月 7 日，日军开始全面侵华，中国民族工商业遭到了战争的摧残。永亨银号更是直接的受害者。一颗炮弹穿透两座楼打入院内，幸亏没有爆炸，然而永亨银号被迫停业了。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家允许原来的字号恢复开业。政府官员多有暗股在各家字号，永亨银号伙友彭恩华、侯玉等出面以永亨银号旧底为基础，请史承镛继续任总经理，开设金丽生银号。据传说阎锡山亲信梁化之在金丽生银号有暗股。此时的东家李毓文疯了，所以金丽生银号只是占用了永亨银号院子而已，李毓文已不起作用了。不过金丽生银号没有存在多久，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

歇业了。金丽生银号的短暂存在，实际上只是永亨银号的尾声罢了。

在永亨银号和金丽生银号存在的 20 多年间，这里基本上保持了百川通时代的原貌。



百川通的建筑风格

百川通票号主院由 3 幢院组成,后院与中院有偏门相通，成丁字形连接，拐往衙门街，作为往来出入的后门。正门五开间门面坐西朝东正对南大街。5 间门面中间是过厅，两边是柜房。柜房的大玻璃窗外是走廊，走廊外有夹扇门保护，白天打开，晚上关闭。南柜房有楼梯通往阁楼。楼上原是贮藏杂物的地方，现已陈设为贵宾接待处。门面建筑雄伟豪华,楼顶比左右店铺高出一截,椽柱梁栋全部油漆彩画，楼檐下方用 30 多块木方格装饰，每个方格内彩绘四季花卉、富贵瓶鼎等图案,中间悬挂一块黑漆大匾,上面的‘百川通”3 个大字用金箔贴出。整体气势显示出大家气派。

百川通大院的布局设计代表了当时大票号最时兴的款式，注重显示气派实力。不仅门面建筑高大雄伟，前院和中院之间又是一座主楼。这样从门庭往里看，给人一种豪宅大院、气度非凡、深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